

《老约翰农庄》中的象征性暴力与凯特的成长分析

蒋花

(四川外国语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重庆 400031)

摘要:《老约翰农庄》中象征性暴力对凯特的影响巨大。发育期、舞会和婚姻、家长制社会、金钱的诱惑、忠诚和背叛交织在一起,使处于青春期的凯特体会和经历了成长过程中各种象征性暴力的打击。面对他者的目光和言语行为、各种习俗和潜规则,她只有妥协,被迫接受象征性暴力的奴役。

关键词:象征性暴力;《老约翰农庄》;成长;他者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9)04-0070-05

尽管人类社会本身是一部暴力史,但由于各种原因,暴力研究被视为禁忌,暴力现象被忽视、压制和被社会政治思想边缘化^[1]。有学者担心对暴力的研究会导导致学者或更多的人模仿或接受暴力。即便如此,对暴力的研究古已有之,只是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时暴力研究才迎来了发展的重要阶段^[1]。但暴力究竟是什么?长期以来,学界对此一直有狭义和广义之说:“狭义上的暴力主要指政治科学领域内未获授权(即非法,不被法律许可)的武力使用;广义上的暴力则涉及社会学、人类学和哲学,包括仇恨的语言、结构或文化暴力和其他诸如画像暴力、媒体暴力和象征性暴力等形式的隐形暴力。”^[1]暴力的本质是对人造成身体或心理或情感上的伤害。杰克曼认为应该对暴力进行系统、不带偏见的研究,因为暴力行为是“人类重要社会行为中一个平常的部分(a normal part)”^[2]。文学作品对这个“平常的部分”自然多有描述,但主要集中在战争、种族迫害、家庭暴力等方面,体现了欧美关于暴力的主流思想。也有一些作品描写了诸如语言、象征等形式的隐形暴力行为,如多丽丝·莱辛的很多短篇小说。

象征性暴力(symbolic violence),又称为软暴力(soft power),是由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概念:“象征性暴力是一种权力,该权力使某个特定社会群体的所有成员接受各种不容置疑、如真理一般的文化准则,从而掩盖了真正的权力体系。其主要表

现形式为社会化和交流活动,目的则是为了发展和实施某些特定的文化模式,如价值观、文化习俗和态度,排斥任何其他可能性。”^[1]通过操控人们的认知网络,象征性暴力可以无影无形却又无所不在、不容质疑^[1]。相比其他具体的暴力行为,象征性暴力更为隐蔽、复杂,对受害者带来的主要是心理伤害和认知上的奴役。本文拟主要分析多丽丝·莱辛的短篇小说《老约翰农庄》中少女凯特经历的各种象征性暴力,以及她最终被迫接受认知奴役的过程。

一、莱辛与《老约翰农庄》

莱辛曾被视为“罗德西亚社会的记录者”^[3]。罗德西亚位于今天的津巴布韦境内,在莱辛的作品中被称为赞比塞,是莱辛生活了20多年的故乡,她的多部作品都取材于该地区。“莱辛对1925—1950年罗德西亚的记载主要覆盖两个领域:一个是1925—1940年的农场生活,另一个是1940—1950年在赛里斯贝里的生活和政治。”^[3]在殖民时代的罗德西亚,“莱辛将犯罪者和受害者都描述为‘暴力的孩子们’(Children of Violence),这也是她专门写的五部曲的命名,用以描绘她笔下的人物在罗德西亚殖民地时身体上和心理上不得不遭受的种族、阶级和性别暴力”^[4]。除此之外,莱辛的作品还探讨了年龄、地区风俗、文化和经济暴力。事实上,莱辛对暴力的描述更多是心理和情感层面,而非战争、身体、物质层面。

收稿日期:2018-10-18

作者简介:蒋花,博士,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文化。

短篇小说《老约翰农庄》讲述的是一群白人农场主在非洲边远地区的生活。由于所处位置偏远,当地人意识守旧,还保留着浓厚的家长制作风。“她(莱辛)试图再现‘赞比塞’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有着乡村的怪人和遁世者(drop-outs),英国农场主和荷兰裔农场主,以及土气、刚愎自用的资产阶级……正是该社会可笑的(stupefying)求同、平庸和偏见构成了莱辛小说的创作题材。”^[5]又“因为‘赞比塞’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殖民地,而且移民政策一直较严格,白人人口增长缓慢且仅局限于几个民族,所以这是个联系比较紧密、循规蹈矩的社会,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和习俗风格”^[5]。小说里,读者可以看到这是个自成王国的地区,农场主们大都手头不宽裕,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秘密,但他们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习俗。以凯特父亲为代表的精神领袖奉行清教徒的生活模式,排斥异类。当地的成年人早已习惯,也许感受不到任何不正常的地方,可新进人士和青少年却特别深切地感受到了这套习俗的暴力本质,他们深受其害、痛苦万分。时尚、有钱的莱西一家搬到此处生活显然不合时宜,特别是他们还试图改变、挑战这套习俗,得到的只有排斥和屈辱。当13岁的凯特目睹、经历这一切时,她纯洁、脆弱的心一次次被撕裂,留下了难以言表的暴力痕迹。或许这正是莱辛所要的移情效果:挑选孩童和脆弱的青少年作为故事主角可以强化小说叙事的移情效果^[6]。

二、象征性暴力之一:性觉醒思想的抑制

13岁的凯特正处于成长的重要时期,从身体上看,个子已经长高,开始发育了。可凯特“穿着粉色的棉裙,屁股只遮住一半,完全是一个6岁小孩的打扮”^[7]。粉色通常被视为小女孩的标志。这样的穿着显然不适合13岁的凯特,但凯特的母亲这样打扮孩子,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思想的因素,她母亲故意抑制凯特的性觉醒思想。无独有偶,《玛莎·奎斯特》(Martha Quest)中的奎斯特太太也让15岁的玛莎穿着小女孩的衣服,完全无视玛莎早已发育的事实。凯特在认识莱西夫人之前并没有意识到穿着体现的性和潜在的道德含义,更没有体会到这样的穿着会带来痛苦和尴尬。随着和“异类”莱西夫人的交往,凯特逐渐感受到了这种象征性暴力的打击力量。当莱西夫人第一次认真观察凯特的衣着时,“凯特知道如果她是莱西夫人的女儿,莱西夫人会按她的年龄打扮她……这裙子让她既痛苦又尴尬”^[7]。凯特的痛苦和尴尬反映了同一性所隐藏的邪恶力量:在安全的旗帜下,同一性抹杀个性、无视

现实。当然,这也和他们家比较贫穷有关。当地的殖民者和凯特家境相当,认知也相差无几,所以对凯特这样的穿着习以为常,在此之前没有人会用莱西太太这样的眼神来打量凯特。但这集体的力量一旦被刺破,便产生了裂缝,裂缝带有刺的功能,让暴力瞬间现形并产生巨大的影响。

三、象征性暴力之二:家庭舞会面具下的真相

当地的庄园主们一个最重要的社交活动就是每家轮流举办家庭舞会,在舞会上,他们形成了一套不成文的规矩,确保他们的“王国”可以顺利运作。如果有人胆敢挑战这些规定,下场会很惨。由于年龄的限制,凯特在舞会中是一个尴尬的存在,一开始男人和女人自动分成两拨,各占一边,而凯特则很无奈:“她年龄太大不能和小孩子一样随便睡在什么地方,可参加成人聚会则又年龄太小;也不能看书,因为这被视为非常不礼貌;什么事也干不了,只能游走在两拨人的边缘……”^[7]但正是由于年龄比较尴尬,她可以旁观,舞会为她提供了一个观察社会、了解风俗的绝佳场所,只是看到的场景太灰暗,而她必须要学会接受。

殖民者们轮流举办家庭舞会,对他们来说既是交流和放松的最佳场所,也是他们书写帝国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即使贫穷,他们也会举办这样的舞会。故事中对此着墨甚少,但仍可略见一斑。凯特“看到黑暗中一群土著在房子外挤做一团,鼻子抵在铁丝网上,用好奇和羡慕的眼光看着白人们的纵情享乐”^[7]。“即使没和黑人接触,种族主义的阴云总是笼罩在白人的头上方,随时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和思考。”^[5]这对凯特来说无疑是了解殖民主义的重要一课。

在舞会上,凯特对婚姻有了一定的了解。凯特知道一般而言舞会有三个阶段,偶尔有第四阶段。在第三阶段,大约从午夜12点开始,男女会坐在一块,严格意义上的家庭单位会解体,一对对的情侣会在一起跳舞、聊天,甚至悄悄转移到黑屋子或黑乎乎的外面。“这种模式对凯特而言就像这个地区在阳光下被剥开了一层帷幕,赤裸、残忍地将另一种事实真相呈现出来。这绝对不许改变,被背叛一方对此默许(他们在某个时候也是背叛者),在整件事的处理上显示出的耐心和谨慎令人最为震惊。”^[7]这些“赤裸、残忍”的“真相”恐怕比真正的凶器更黑暗,残暴地摧毁了少女对美好婚姻的憧憬。婚姻远非圣洁,掺杂了太多污垢。凯特小小年纪就得抛弃关于

婚姻的童话,接受实用有效的婚姻模式。凯特发现这时婚姻是无效的,人们公开默许调情和偷情。就像维特利先生和南·富勒的私情众所周知,他们甚至在维特利太太眼前公开亲热,而维特利太太则假装无视这一切。缘何如此,第三人称叙事者解释了原因,“一些大家公认的危险之事,必须给予自由,这些事通常在舞会上冒出来,而且仅仅出现在舞会上,如果强行禁止的话会更加危险”^[7]。多次参加舞会后,凯特已经学会了接受现实版的爱情,并不会对各种各样的爱情感到吃惊了。“爱情这字眼,包括了如此多的情感、氛围和情况,其内涵已经大大延伸,对凯特而言,这字眼弹性十足,所以再怎么变化也不会让自己吃惊了。比如,爱情可以是莱西夫人在给客人倒饮料时表现出的默契和爱意,也可以是莱西夫人和赫克特先生打着在储物间找东西的借口偷情……”^[7]这对一个年仅13岁的少女来说,不啻为莫大的讽刺。“不会让自己吃惊了”是无奈,也是妥协,更是麻木。舞会的几个阶段作为习俗和第三阶段暗含的潜规则无影无形,却又无所不在,充分体现了象征性暴力的本质。作为团体成员,凯特只能调整自己去适应它们,麻木也许是最好的适应。

四、象征性暴力之三:父权制社会的压迫

“社会学家们声称人类和他们的猴子祖先一样,只有和自己部族的成员在一起,能本能地理解这些人的习惯和关系时,他们才会感到完全放松和自在。”^[8]在这偏远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大体一致,都不太富裕,异类(有钱)的辛克莱夫妇遭到无形的排挤而搬走了。科普先生在这地区可以说是大伙的精神领袖、大家长,或者说是“集体精神”(collective conscience)。当科普先生为莱西太太新潮的礼服发火时,“大伙的脸上既没有吃惊的表情,也没有赞同的表情;他们就像一个个小孩,看父亲或母亲的态度以便确定在招致反对之前他们能走多远”^[7]。作为家长,科普先生的观点代表了整个地区的声音,众人无不看他的脸色行事。如果超出了他所认可的范围,必定招致打压。莱西太太有自己独立的看法,这严重挑战了父权制社会的权威。未搬到这之前,凯特就偷听到前任房主辛克莱夫妇讨论即将接手房子的莱西一家时,毫不隐晦地说,他们在此呆不久,辛克莱夫人甚至说,“我真的不敢相信他们能在此地呆上六个月。毕竟,她(莱西太太)不是这样的人——我的意思是她至少有些想法”^[7]。虽然辛克莱夫人没把理由讲出来,但其鄙视的语调和表情至

少传递了一个信息:莱西夫人肯定会成为该地区的异类而受到排挤。在其举办的第一次舞会上,莱西太太改变了舞会的固定程序和安排。莱西太太漂亮的礼服力压群芳、鹤立鸡群,引起了其他女人的嫉妒,其时尚的裁剪方法更一度成为女人们每天谈论的对象。莱西太太在无形中悄悄改变了该地区固定的生活方式,这让科普先生极度不安。莱西太太打破常规的舞会安排,直接省略第二阶段进入第三阶段让男男女女成对坐在不同地方,让一度来晚的科普太太好不尴尬。当放纵的时刻到来时,莱西太太深谙此道,把情侣们安排得很好,自己一方面协调各方关系,另一方面也偷空和丈夫的合伙人赫克特先生调情^[7]。在第二次舞会上,除科普太太以外的女人们已经习惯了莱西太太的某些做法,比如把孩子放在一边,自己开心地去玩,也开始学莱西夫人穿晚礼服参加舞会。但莱西夫人低估了当地社会中父权制思想的影响力,或者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当她拉着凯特到众人面前宣布要给她介绍男朋友时,遭到了凯特父母和所有人的抗拒,“太过火了,走远了”^[7]。莱西夫人一再挑战以科普先生为首的传统力量,终于遭到了后者的公开排挤,结果输得很惨。当看到莱西一家为拯救自身形象参加星期天教会活动时,凯特觉得很好笑。当看到母亲冷对莱西太太的寒暄,邀请在场所有人到家吃午餐唯独漏掉莱西一家时,凯特内心再也无法平静。当科普夫妇恢复了晚会的传统模式时,凯特愤怒了。可是她只能偷偷跑到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避难所放声大哭。她为莱西夫人的失败而痛哭,她为自己的无力反抗而痛哭,她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真实情感而痛哭。总之,她必须放弃莱西夫人,回到父母的阵营,她必须是父母所代表的父权制社会的同谋犯。凯特同情莱西一家,特别是莱西太太。父母特意公开孤立和羞辱莱西一家,也就是公开了他们对这家人的厌恶。父母代表了当地的主流意识形态,他们的言行是人们的坐标,所以莱西一家注定在此地再没了立足之地。当莱西太太再次邀请凯特到她家去玩时,凯特内心非常苦涩和纠结,她喜欢莱西太太代表的新潮,但也知道莱西太太在利用她,更重要的是她不是玛莎,没有能力也不敢改变传统道德,更不敢反抗父母。“她必须放弃那些独立的方面,这些方面会让她被父权制社会所不容,所以她必须找到将她的观点和别人对她的期待值相妥协的方法。”^[9]所以在最后一次拜访莱西太太时,凯特于心不忍,出于好意劝莱西夫人离开这个地区,“你应该搬去别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找到和你一类的人”^[7]。父权制社

会对异类的排斥和打压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性暴力的表现,它不允许挑战现有秩序。敏锐的凯特捕捉到了父母对莱西一家的态度变化,体会到了莱西夫人被排挤的痛苦和愤怒,但她只能摒弃那些不被父权制社会接受的观点,痛苦地妥协,接受父权制社会的运作方式。

五、象征性暴力之四:莱西夫人的利用

“模仿是人类思想的天性……这在女性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10] 故事中多次提到凯特模仿其母的思维方式、语气和讲话方式。可以说父母对凯特影响很深,有些观念甚至已经根深蒂固。在和莱西夫人交往之前,凯特毫无疑问忠诚于父母,很多时候不自觉地用父母的标准来看待事情。莱西夫人第一次到他们家拜访时,一家人都被她迷住了,但凯特却敏锐地感觉到事情没这么简单,莱西夫人刻意的讨好说明父母并不赞同她的行事方式,她在放低身段请求谅解,只是凯特并不知道是哪些方面。“她知道并不是养马这档子事,虽然养马引起了大伙的反感,就像她知道并不仅仅是莱西夫人亲热的举止让她父亲不安似的。”^[7] 姑娘对莱西太太又爱又恨,觉得她功利性太强,对自己敷衍却又需要自己以便赢得其他人的认可,特别是父亲的认可。她知道莱西夫妇肯定会受到排斥,尽管对她来说,这家人充满诱惑^[7]。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家人太有钱,太与众不同了。“在莱辛的笔下,经济问题被视为构成种族问题和白人社会的基石,体现了经济作为基础的重要性。”^[3] 在这里,贫穷是白人最大的罪恶。由于手头不宽裕,当地人自发形成一个阵营,有自己一套不成文的规矩,还有大家长,以便可以安全地抵御异类入侵。所以,老约翰农庄的主人都是过客,因为他们有共同特征:有钱、有想法,和其他人不一样。因此,有钱的莱西一家显然打破了平衡和安全。凯特对莱西夫人的震撼、着迷跟她家的财富密切相关。莱西太太所代表的新潮和富足让凯特大开眼界,让她忍不住喜欢和欣赏,说到底,这是金钱的诱惑。凯特每天都想去莱西家,尽管莱西太太并不是真正热情地欢迎她。一天早上当她忍不住站在自家院子里打望对面的莱西家时,母亲微笑的脸由于嫉妒扭曲了,母亲痛苦地问她,“如果你可以生活在那里,你会愿意的,对吧?”“所有那些新潮、时尚的服饰和新玩意,我们根本没法和别人比,对吗?”凯特的笑容一如她妈妈——扭曲、嫉妒,但那天她没去莱西家^[7]。凯特的母亲尚且不能掩饰对莱西一家的嫉妒,何况年少的凯特,但前者知道在其他场合压抑和节制这份贪

念,可对凯特来说却太难,就像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一样,一切都很新奇。不同的是凯特深受父母传统思想的影响,在被诱惑的同时一直保持着警惕,可结果是情感分裂,忠诚和背叛一直折磨着她。

矛盾的情感让凯特逐渐偏离对父母的忠诚,她开始有意识地颠覆父母所代表的准则。为了满足刚刚从莱西夫人身上获得的那份喜爱,凯特有意识地误导父母,让父母不至于那么快排斥莱西夫人。凯特的做法体现了成长小说中女主人公所具备的能力,即“操控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她的期待值,以期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9]。凯特明知父母不喜欢她和莱西夫人交往,仍然先斩后奏,趁父母都不在家时,将自己的行踪通过仆人转达给母亲,又去了莱西家。虽然凯特知道自己的行为相当可笑,有一种背叛父母的罪恶感,但是她仍然抵制不了对莱西一家的热爱,莱西家的房子、奢侈品……牢牢吸引住了她的眼球^[7]。莱西夫人并没有真诚地回报凯特对她的迷恋和崇拜,相反,她势利和算计,对凯特的好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凯特深知这一切,她的心被撕成了两半。“一整天凯特觉得自己遭遇了一种新的情感,被利用再被打发掉,一生中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利用过;一生中从未经历过如此强烈的矛盾感情,既喜爱又忍不住要批评,既羡慕又忍不住怀疑。”^[7]“感觉被利用”也是象征性暴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施暴者毫不掩饰其动机更让人愤怒,因为这是一种蔑视,赤裸裸的蔑视,也是对真情的直接践踏。莱西夫人根本不在乎凯特的感受,也根本不在乎凯特的看法,可以说将象征性暴力的伤害发挥到了极致。对处于青春期的敏感少女来说,内心的矛盾和纠结、羞愧和愤怒无疑会留下深深的痕迹,影响她对人性、友谊的看法。

六、结语

《老约翰农庄》生动地刻画了13岁的凯特在成长过程中遭遇的各种各样的象征性暴力。身处殖民时期的非洲边远地区,凯特在舞会上看到并认识到婚姻和爱情的阴暗潜规则,由最初的震惊到后面的麻木,凯特对此的反应揭示了这类潜规则所代表的象征性暴力,它们在一次次舞会中不断重复,地位不可动摇,凯特只能接受。与莱西一家特别是莱西太太的接触让凯特不仅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体验,而且深刻体会了父权制社会的强大和冷酷,其代表的象征性暴力顽固地维持传统,打击排斥标新立异的行为。除此之外,莱西夫人对凯特的算计和利用何尝不是另一种象征性暴力,她完全无视凯特的情感和看法,让凯特内心分裂、痛苦不已。各种象征性

暴力伴随着凯特成长,所以她的成长只能是一种痛苦的经历。

在此特定的环境下,凯特通过观察和体会,内心所经历的惊涛骇浪绝不亚于成长小说中男主角离开偏僻的乡村到凶险的大城市所经历之事。如果说男主角们遭遇的是身体和心理各方面的暴力考验,凯特所体验到的更多是思想、情感方面的挑战、压制和妥协。如果说农场舞会是成年人合法的放纵场合,于凯特则是尴尬的学习场所;如果说莱西一家子让父亲不满和烦恼,于凯特却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充满了诱惑,时时挑战着她从父母那儿受到的宗教道德熏陶。凯特在和莱西太太的接触中经历了热爱、崇拜、忠诚,也经历了嫉妒、背叛、被利用、被轻视、分裂的种种痛苦。身为地区家长的女儿,凯特不得不学会压抑天性、与主流社会妥协,甚至作为主流社会的传话筒。凯特的成长模式属于学习型,而非觉醒类的成长模式^[1],体现了莱辛作品的一个基本特征,因为莱辛作品传达的主要经验教训是成长、特别是意识成长的必要性。他者的目光、言语行为、各种习俗和潜规则无不刺激着凯特的神经,她感受到也意识到了各种复杂隐蔽的象征性暴力,却无力改变,只能独自经历和体会成年人世界带给她的各种震撼和痛苦。

参考文献:

[1] Mider D. The anatomy of violence: A study of the literature

- [J].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013(18): 702-708.
- [2] Jackman M R. Violence in social life[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2,28(2): 387-415.
- [3] Bertelsen E. Doris Lessing's Rhodesia: History into fiction [J]. *English in Africa*, 1984,11 (1): 15-40.
- [4] Muchemwa K Z. Polarising cultures, politics and communities and fracturing economies in Zimbabwean literature[J]. *Social Dynamics: A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2011, 37 (3): 394-408.
- [5] Style C. Doris Lessing's "Zambesia" [J]. *English in Africa*, 1986,13(1): 73-91.
- [6] Keen S. Human rights discourse and universals of cognition and emotion[M] //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Zunshine L. (ed.).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7] Lessing D. Old John's place [M] // *This Was The Old Chief's Country*. London: Michael Joseph LTD, 1973.
- [8] Barstow P. The English country house party [M]. London: Sutton Publishing Ltd, 1989.
- [9] Ellis L. Appearing to diminish: Female development and the British Bildungsroman, 1750—1850 [M].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1999.
- [10] Gisborne T. Enquiry into the duties of the female sex [M].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797.
- [11] Abel E. The voyage in: Fiction of female development [M].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3.

[责任编辑 亦 筱]

(上接第 64 页)

于一个更为复杂的环境中。这也让罗辰生的儿童文学创作对儿童形象的挖掘从公共领域的“红领巾”“新世纪公民”深入到个人化的表达中,更加凸显了儿童个体的性格与情感。

综上所述,罗辰生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儿童文学创作具有如下特征:乡村经验中固有的民间讲故事的传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叙事风格和人物塑造的方式;教师经历让他一开始就从教育理想的儿童入手去书写个人经验与时代号召双重影响下的理想儿童,这就让他笔下的儿童形象同时呈现了公共视域中

集体的儿童——“少先队员”、“公民”和个人化的儿童表达——家庭中的儿童。因此,融入教育理想的儿童人物形象塑造成为罗辰生儿童文学创作的核心。

参考文献:

- [1] 罗辰生. 吃拖拉机的故事 [M]. 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7.
- [2] 程逸汝. 儿童小说十家 [M]. 郑州:海燕出版社, 1989.
- [3] 罗辰生. 新来的班主任 [J]. *人民教育*, 1980(5): 52-58.

[责任编辑 于 湘]